

凭窗读史

她们唱出了江南最美的声音

苏州评弹是一颗璀璨的“江南明珠”，被称为“最美的声音”。有这样一批卓有成就的名家，她们塑造了许多光彩熠熠的艺术形象，用优美的唱腔唱出了“最美的声音”。她们的艺术人生多姿多彩，悲欢交织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都是用生命在歌唱。



蒋月泉、江文兰搭档演出《玉蜻蜓》。



徐丽仙演出照。



余红仙演出照。资料图片

一曲《蝶恋花》唱红全国

2023年8月19日，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余红仙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。评弹爱好者无不感到悲伤。而她的名曲依然在人间余音袅袅。

余红仙演唱的长篇书目《描金凤》《双珠凤》等深受听众的欢迎，而最为人知的还是她演唱的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。余红仙第一次演唱《蝶恋花》还是在1958年的秋天。

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最初发表于湖南师范学院报《湖南师院》1958年元旦专刊上，《文汇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诗刊》等相继转载，一时在文坛引起轰动。青年评弹演员赵开生读后非常激动，想将之谱写成弹词曲调。要创作，首先要弄懂词作的内容、意境、写作背景等，于是他请作家朋友为他讲解柳开慧、柳直荀的革命故事等。这些激发了赵开生的创作热情。他融合了蒋调、俞调、丽调、薛调等多种弹词流派的旋律，并吸收歌曲和京剧导演手法等营养，谱出一首清新的曲子，曲调优美深情，较好地体现了词作的精神。1958年秋，由余红仙在西藏书场试唱《蝶恋花》，立即受到听众的热烈赞赏。1960年夏，赵开生、余红仙参加青年评弹演员夏季集训后，继续对《蝶恋花》进行修改、加工。在著名演员周云瑞、徐丽仙、张鉴国等的帮助下，这首曲子日趋完善。

1960年8月，中央领导在上海开会，有一次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安排一个晚会，余红仙演唱了《蝶恋花》。余红仙嗓音清越，音色华美，演唱富有激情。当她唱到“寂寞嫦娥舒广袖，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”，旋律舒展摇曳，而唱到“忽报人间曾伏虎，泪飞顿作倾盆雨”时，激昂有力，响遏行云。她的演唱生动地展现了革命家的伟大情怀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陈云同志和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听了都非常赞赏。那天周恩来总理因为有事来晚了。陈云同志向他介绍说：“评弹有个《蝶恋花》，很好，您可以听听。”于是余红仙又唱了一遍。演出结束后，周总理特意上台祝贺演出成功。他高兴地对余红仙说：“《蝶恋花》的曲子谱得很好，唱得不错，尤其是最后两句更有激情。刘少奇同志也听了余红仙的《蝶恋花》，演出后与她握手，亲切地叫她：‘几岁了？人团了没有？你们的伙食怎么样？’这些话说得她心里暖乎乎的。”

1961年1月22日，上海交响乐团、上海合唱团联合举行音乐会，弹词《蝶恋花》被搬上了交响乐团的舞台，此曲由余红仙独唱，上海合唱团200人的合唱队伴奏，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。经过音乐家黄贻钧、司徒汉等人的精心编配，作品更加完整，以抒情的演唱和恢宏的气势轰动乐坛，从此享誉全国。

1960年12月，余红仙加入了名家云集的上海人民评弹团（今上海评弹团）。余红仙进团后，如鱼得水。她与多位名家搭档演出，如与陈希安演唱《党的女儿》，与徐丽仙演唱《双珠凤》。1963年至1965年间，她又与弹词大家蒋月泉搭档演唱现代长篇《夺印》，还参加了《人强马壮》《战地之花》《红梅赞》《晴雯》《点秋香》等多部中篇评弹的演出。在评弹界有“唱不哑的金嗓子”“唱勿煞的余红仙”等美誉。她不仅弹唱出色，而且台风稳重，说表清晰，角色刻

的老师。他也是擅唱《玉蜻蜓》的名家，早在20世纪40年代，他与蒋月泉搭档的“蒋月档”就是评弹界“四响档”之一。这次演出基本上依照蒋月泉原来的演出本，但也作了必要的充实和调整，使每回书上下手都有唱篇，江文兰起唱儿沈方的角色时还吸收了话剧、电影里男孩子的声音，使语言更贴近人物年龄、身份，而且可以更鲜明地区分出沈方与沈君卿的不同音色。

江文兰与三代弹唱《玉蜻蜓》的名家合作，担任下手，做得非常出色，都能相得益彰，有高水平的发挥，因此获得了“评弹硬杠子”“超级女下手”的称誉。

生命的绝唱

徐丽仙原名徐招娣，是苏州枫桥人，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，幼年时就被卖给富裕社班主钱锦章做养女，取名钱丽仙。11岁起，她随养母陈亚仙习长篇弹词《倭袍》，并随养父母在茶楼、酒肆卖唱，其间也曾学唱苏滩、京剧、江南小曲。15岁起，她以钱丽仙艺名与师姐刘美仙并双档在江浙一带演出《倭袍》《啼笑因缘》，他受养父的剥削虐待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戏班钱锦章被政府镇压，徐丽仙恢复了本姓。

随后徐丽仙收徒包丽芳，并与她搭档演唱《啼笑因缘》《刘胡兰》等书目，渐有名声。她富有音乐天赋，经常琢磨新腔。1951年，上海评弹界妇女组排演书戏《众星拱月》，她因报名迟了，只摊到一个小角色，但她充分发挥沙哑的嗓音特点，仅有的一句唱词“光荣妈妈真可敬”唱出了新腔，这就是“丽调”的雏形。1953年，徐丽仙加入了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，有机会与许多名家合作。她先后与姚荫梅双档演唱长篇《方珍珠》，与刘天韵合作演唱长篇《杜十娘》《王魁负桂英》《三笑》。1953年她演唱中篇《罗汉钱》时，基本形成风格独特的丽调。丽调用女声真嗓演唱，在蒋调的基础上，吸收沈薛调、徐调以及北方曲艺和其他戏曲的营养，曲调清丽深沉、委婉缠绵。她特别吸收4、7两个音的运用，成为丽调的特征。

她对音乐曲调的创作用心很深。有一次，她为了创作一支开篇，冒着小雨，在大街上来回走动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这一举动引起了联防队的怀疑，把她带去盘问，后家人送去证明，误会才得以消除。她在演唱《情探》期间，经常带了琵琶到作者平襟亚先生家里，向他请教作品和唱词的内涵，并商量唱词的编排，平襟亚写出了“梨花落，杏花开”等精彩唱词，还突破成规，给她写了“天昏昏，地沉沉，虎狼毒，毒蛇心，负恩义，灭人伦”的唱词，连用六个三字句，徐丽仙以此谱出了优美的新腔。徐凌云、陆澄安等也为她提过技术性的意见，她还得到刘天韵、蒋月泉、姚荫梅、周云瑞等名家的帮助。

1958年，有一次评弹团团长兼作者吴宗锡听收音机，听到徐丽仙在唱开篇《花木兰》。他觉得以前她的唱腔比较柔和缠绵，但这个开篇唱得很硬朗。他想徐丽仙也可以向这方面拓展，试着唱唱唱腔强一点的内容，于是找徐丽仙商量。他说：“我读过南北朝的民歌《木兰辞》，我可以改编一下，你试试看。”徐丽仙很同意这样的想法，一口答应试试。吴宗锡把原来的五言诗，改成适合弹词演唱的七言句，写成了《新木兰辞》，交给徐丽仙谱曲。徐丽仙注意突出巾帼英雄的气概，吸收了京剧小生的内容，巧妙运用张口音，谱出了一首刚柔相济的曲调。1958年徐丽仙在上海市曲艺会演上演唱，引起强烈反响，《文汇报》发表专评，称《新木兰辞》为评弹“珍品”。1959年周恩来总理曾聆听徐丽仙演唱此曲，很是赞赏。之后根据领导意见，她增加描写木兰战斗生活的唱词四句，《新木兰辞》成为丽调代表作。后来她又谱唱了《六十年代第一春》《见到了毛主席》等欢快、深情的开篇，使丽调有了新的发展。徐丽仙在音乐方面的杰出贡献，得到了音乐界的首肯，她被推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。

1977年，正当徐丽仙的艺术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她查出患了直肠癌，这真是晴天霹雳。她为了能继续演唱，拒绝手术，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，顽强地与病魔搏斗。其间她曾到北京治疗。1978年6月陈云同志亲自到文化部招待所探望徐丽仙，详细询问病情和治疗情况。

1981年春，中国曲艺家协会上海分会、上海评弹团联合举办“丽调流派演唱会”，她抱病登台演唱了自己的新作。1982年，在全国曲艺会演（南方片）中，她谱曲的《望金门》和《二泉映月》双双获奖，她本人荣获荣誉奖。

为了把徐丽仙的艺术抢救下来，1982年6月，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在吴宗锡陪同下，登门拜访徐丽仙，与她商议为她拍摄录像片的事宜。当时徐丽仙已经十分虚弱，讲话发音也不清晰，但对此事仍然充满热情，还拿起三弦弹奏她的新作《行路难》。他们当场商定了拍摄的计划，6月就在上音开拍，由上音录制，上海艺术研究所电声部协助。录像期间，她的好姐妹范瑞娟、杨飞飞都来看望她。她演得极其困难，累了，就休息一会，有时喂她冰块含着，来缓解舌头的僵硬和疼痛。她以惊人的毅力，录制了《情探》《社员都是向阳花》《六十年代第一春》《罗汉钱》《青年朋友烦恼》《新木兰辞》等六个曲目。这成了她生命的绝唱！

沈鸿鑫文/图



王士禛画像。

淄博文豪的京官生涯

学霸诗人 文坛领袖

古藤书屋的主人王士禛，自幼聪慧过人。他5岁人家熟读书，7岁熟读《诗经》。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，应童子试，接连获得县、府、道第一名。17岁乡试中举人，21岁会试中进士，这在科举史上是罕见的，堪称学霸。另外，他的书法童子功亦非同小可，9岁即能草书。此后，书风与诗风一样，历经数次变化，早期率真狂放，中年以后潇洒飘逸，韵味悠长。

康熙十一年（1672年），王士禛任户部郎中时，康熙皇帝问一位内閣学士：“当今博学善诗文者，哪个人第一？”那位内閣学士回答：“为首应是王士禛。”康熙皇帝又问冯溥、陈廷敬、张英等大臣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，当推王士禛。于是，康熙皇帝在慈宁宫召见王士禛，命其即席赋诗。王士禛出口成章，令康熙皇帝大为赞赏。此后，他改授翰林院侍讲，不久升任侍读，入职南书房。对王士禛的才学和诗文风格，康熙皇帝颇为欣赏，称赞他“博学善诗文”“诗文兼优”，并下诏让他进呈书稿。王士禛甄选诗文300篇，辑为《御览集》，呈送康熙皇帝后，康熙皇帝时常阅读。对一个文人来说，这无疑是大大的荣耀。那一年，王士禛38岁。

王士禛诗文虽好，却从不以诗文向权贵献媚。权臣明珠做寿时，众官员趋之若鹜。有个大臣试图趁明珠功绩的祝寿诗。王士禛当即拒绝，并义正辞严地说：“曲笔以媚权贵，君子不为也。”身处勾心斗角的官场，却不同流合污，难能可贵。

以诗文名扬天下，并被公认为文坛领袖的王士禛，主要成就在诗创作及诗学理论方面。他一生创作诗歌4000多首，著有《渔洋诗集》《渔洋续集》《蚕尾集》《蚕尾后集》《过江集》《白门集》《神韵集》等数十种。在诗词创作方面，王士禛是“神韵说”的践行者，但他提出这一主张后，并未系统阐述。有人认为，王士禛的“神韵说”包含两层意思，一是指诗歌艺术风格，“优游不迫”与“沉着痛快”并举，同时侧重于古淡闲远，简称“并举说”；二是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，重在诗的内在品质，简称“统一说”。对王士禛的“神韵说”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而其学术价值在于超越了传统文学研究所执着的具体文本形式，对古典作品艺术价值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可谓别开生面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王士禛在实践“神韵说”并取得丰硕创作成果的同时，突破了正统文坛和文人偏见，重视并高度评价小说、戏曲、民歌等通俗文学形式，在小说、戏曲、民歌、书

画、藏书、史论等领域均有建树。他的文学作品既有阳春白雪，亦有下里巴人，雅俗共赏。

大名鼎鼎的清代诗人、文学家、诗词理论家王士禛在京做官期间，曾在这里居住。据说，他在北京南城还有另外两个住处，分别为慈仁寺（报国寺）和保安寺。王士禛在西太平巷5号居住时，庭院里有一株粗壮的紫藤，所以他将自己的宅院命名为“古藤书屋”。现在，这座院落为民居。

体恤民情 为官清廉

王士禛，字子真，号阮亭，又号渔洋山人，世称王渔洋，山东新城（今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）人。他的原名叫王士禛，逝世10年后，雍正皇帝即位，因“禛”字犯忌讳，改称士正。乾隆年间，又因“正”字与原名发音不同，改为士禛。

出身于官宦世家的王士禛，自幼受到浓厚家风的熏陶。在山东新城，人才辈出的王氏家族被称为“齐鲁第一进士家族”，从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的300多年间，这个家族出了30位进士、52位举人、158位贡生，为官者100余人。当地人戏称“王半朝”，意思是王家的官员可以组成半个朝廷。因王家曾四代官至尚书，山东桓台境内至今还有歌颂王家功德的砖牌坊，上面刻有明代董其昌题写的“四世官保”四个大字。

王士禛的父亲王与有三个教子有方，四个儿子中有两个中进士，分别为王士禄、王士禛和王士禛。他们走上仕途后，均以政绩和诗文闻名于世。父亲对王士禛说得最多的一句话，是“为国效力，泽延后嗣”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，王士禛从家乡启程赴扬州担任推官。父亲考虑到他年少为官，缺乏经验，而且是掌管司法事务，关系到黎民百姓的生死安危，一旦闪失非同小可。于是，便随王士禛一同前往，以随时监督儿子的言行。作为王家第八代传人，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，又兼清初文坛领袖，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，均有很好的口碑，这与其父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。

从初任扬州推官，到后来逐步升迁，直至跻身六部九卿之列，王士禛始终记得父亲的教诲，秉持“居官以得民心为主”的从政原则，留下了许多勤政爱民的佳话。王士禛赴任扬州推官前，那里每年四月琼花盛开时都举办迎春会，兴师动众，锣鼓喧天，官员的轿子招摇过市。观花后，各级官员聚饮欢庆，纵情于声色犬马，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，所耗费的钱财悉数由当地百姓均摊。王士禛到任后，力谏知府取消迎春会，以正官风、平民怨。由于他态度坚决，“迎春会”最终被取消，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

世代相传的良好家风，使王士禛成为一个清正廉洁、体恤下情、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。在扬州为官期间，他审结了“盐商积欠欠税银案”“通海大案”等多起积案。在审理这些案件时，他始终坚持“民心为上”的原则，既得到了朝廷的认可，又赢得了百姓的信赖和敬重。王士禛离任后，当地百姓感念其恩德，在扬州修建了

岳强文/图



《王士禛放鸭图》卷 禹之鼎绘